

學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五日

第五十七期

《學言》目錄

北京文化之旅—特稿

本會通告	1
許志毅：《為“北京文化之旅—家國之心”而寫》第六講：辛亥革命功未竟.....	1
陳健恩：北京現場反思（三）：天壇、袁崇煥（佘義士）、盧溝橋	4

本會通告：

- “**北京文化之旅**”，在炎炎夏日當中，汗流浹背，歷史的場景，親臨眼前。北京所背負的，不單只有汗水，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、與中華文化存亡的責任，這就是**家國之心**。
- 為此旅程，我們將於本月每七天出版一次，連刊四期，盡早為大家報告旅程中的得著與反思。
- 本刊設有網頁版，可參看過往內容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《為“北京文化之旅——家國之心”而寫》第六講：辛亥革命功未竟

許志毅

從上述霍元甲之軼事，可以折射出當時國人的狀況。人身處於大時代，隨時隨地都面對著種種困難與挑戰，而面對國家前途，真的是不可獨善其身。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無奈，但是我們從霍元甲的一生，就可以看到“接受”、“使命”、“承擔”、“創造”等之積極精神，其實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增進的內涵。

自強不息靠自強

從戊戌政變一事，我們可以這樣看。自鴉片戰爭以來，有識之士都看到外國人的技術先進、軍事發達，認為我們一定要急起直追，所以有洋務運動的產生，欲“師夷之長以制夷”。至中日甲午戰爭，幾十年來在技術層面的改革，可以說是失敗了。於是有康有為等所提出之戊戌變法，希望從政治制度的層面進行改革，可是這舉動觸動了保守派的神經，結果慈禧太后先發制人，發動戊戌政變，軟禁光緒皇帝、殺害變法中人。由此可見，真正讓中國落後、讓人民水深火熱的原因，並非外國人的強大，而是內部的腐敗、不爭氣，特別是朝廷權力階層管治

的問題，可以說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。國人之中，不乏有識之士，可是朝廷為了私欲、權力控制等問題，雖然面對外敵虎視眈眈，但是對於自己國民，甚至是可用之人，都殺無赦。霍元甲之朋友王五、王五之結拜兄弟譚嗣同等等，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犧牲的。元甲面對如此大勢，難免會生起“空負一身絕學，卻無用武之地”之歎，時不與我、沒有希望、茫茫然等之感，這是對時代的無奈與悲哀。生命是這樣的，當你還有一念依賴、一念埋怨的話，那麼你的生命還是沒有得到真正的主宰、真正的自由，只是隨風擺柳。當元甲發現，雖然自身沒有任何憑藉、去到絕地，但是只要不放棄，往內自省，就會發現真正的力量原不在外。我們不妨投入他的生命去反省：元甲年少時因天生體弱，故父親不允許他練武功，但是他就秘密學習、偷偷練習、不斷鑽研，不單止身體強壯起來，還練得一身神力，而且武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被他父親另眼相看。這是靠甚麼？就是靠內心一念的自我要求、不放棄、向上之心。內心“自強不息”的一念才是主，在現實中的一切都是客。人在當中不要錯認、不要本末倒置。所以，當元甲“自反而縮”，就發現內心強大的力量，由此而可以有無窮的開創。準此，在當時的變法過程之中，當時的讀書人還是有著一種空想，以為只要有光緒皇帝的同意、只要能說服袁世凱，就可以順利推動變法。這當中還有一念的依賴與憑藉。其實，光緒皇只是“無兵司令”，根本上是沒有實權的；而袁世凱則是一個機會主義者，只是想找機會得到好處，是沒有任何堅定立場、更沒有任何為國為民之心的。結果袁世凱一轉身，就向慈禧太后告密，就搞出政變，軟禁光緒，擊殺變法人士。現實始終是歸現實，處理現實的問題，就要有非常手段。所以當時的變法中人，還是保持一種太過簡單、實際上是依賴的想法，卻沒有做好基礎工夫、沒有搞好部署、沒有充實力量，若這樣就想成功變法，真的是空想。要成事，真的要非常通透，要處理很多層次的人事，哪有這麼簡單。當時的讀書人，著實因為時代太過緊逼了，面對國家滅亡之際，行事不免有失，這些都是悲慘的教訓，我們要從中得到啟發，不再重蹈覆轍，才不負先賢的付出與犧牲。

成賢成聖唯一念

義和團一事，上文也分析過了。這裡進一步指出一個意思：人到了絕境，真的要麼成仁，要麼就成魔，真的是一念之差而已。上述談到，元甲一念自省，就看到理想的大道。然而，包括慈禧在內的朝廷中人，在絕境的時候，完全沒有辦法了，可是卻完全沒有自省，沒有一念自我承擔，並且還有一念私欲、一念僥倖、一念依賴，那麼就會出現種種“非理性”的想法。因此，竟然連充滿迷信、荒誕離奇的義和團都可以被重用，結果引致更大的禍害！這些教訓真的是痛哉，痛哉！切戒，切戒！

至於外國大力士來華鬧事的問題，我們除了看到元甲的勇氣以外，還看到他的氣度胸襟：“此事非個人之事，個人的勝負事小，國家民族的打擊才是大事”，故此他願意挺身而出，據理力爭、爭取到底，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這就跟上述“在絕境的時候，完全沒有辦法了，可是卻完全沒有自省，沒有一念自我承擔，並且還有一念私欲、一念僥倖、一念依賴，那麼就會出現種種‘非理性’的想法”的情形，可謂完全相反。面對大時代的問題，這種胸襟氣度十分重要。

歷史發展至此，當時很多有識之士都看到，靠改革政治制度的方式去救中國，是沒有希望的了。如此，就只有餘下最激烈的途徑——革命推翻腐敗的滿清！元甲雖然只是一介武夫，但是他也明白此途，他參與革命的辦法，就是透過武術鍛煉，以“尚武精神”提升國人的素質，為革命培養人才。如果能把這一點眼光進一步提升，就是“以文化教育救國”的思想源頭了。是的，要國家強大，就要培養人民的素養才行，有此基礎，國家才能走向光明。

何去何從圓革命

我們不妨看看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的情況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，但我國的貧窮落后、制度腐敗、內憂外患等卻還在，接踵而至的軍閥割據與戰亂，為何如此？孫中山先生雖有遠見，提出了《三民主義》：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方面的理想，可是絕大部分的革命中人，都認為推翻滿清政權，處理了民族、民權的問題就已經功德圓滿，所以當孫中山先生要推動搞好民生的課題時，也難於得到黨人和應。難怪孫中山先生臨終時說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。”那麼，我們該當如何努力呢？

北京現場反思（三）：天壇、袁崇煥（余義士）、盧溝橋

陳健恩



歷史很巧合，1449 年（己巳之役），兵部尚書于謙，慘遭殺害。180 年後的（己巳之役），兵部尚書袁崇煥，也慘遭殺害。

《袁崇煥傳》—從略

努爾哈赤，創建八旗軍，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騎兵部隊。明軍錯殺了努爾哈赤的祖父及父親，努爾哈赤含恨起兵，九日內攻陷遼東沈陽及首府遼陽。敗報傳出，70 多城官民自動投降，舉朝震驚，京城九門，白天關閉，朝廷官員，密囑家眷，收拾細軟，回老家去。於此情勢，袁崇煥單騎出關，豪言壯語：“予我軍馬錢穀，我一人足守此！”袁崇煥終破格留用，再言：“不但鞏固山海，即已失之封疆，行將復之。”天啟帝賜帝師大學士孫承忠尚方寶劍，與袁崇煥一同前行。

袁崇煥於山海關 200 里外，修建寧遠。寧遠初由極度荒涼，變得商旅駢集，遠近望為樂土。於是再推前 200 里，修建錦州，形成 400 里的“關寧錦防線”。

努爾哈赤最終發動傾國之師，進攻寧遠。結果努爾哈赤遭到 44 年來最嚴重的挫敗，還在回返途中病重離世。兵部尚書王永光向皇帝稟報：“八年來賊始一挫，乃知中國有人矣！”袁崇煥即升任為遼東巡撫。

皇太極繼位，他一直隨父征戰 15 年，為人足智多謀，未嘗一敗。第二年，皇太極親率六大貝勒，兵分三路進攻錦州。袁崇煥也接母親及妻子於錦州，誓言“土地破則家與之俱亡”。最後，皇太極仍敗於袁崇煥手上，使他左位十七

《學言》

網站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勝利後獲領功者 5690 人，大太監魏忠賢，以運籌帷幄，獲頭功。連魏忠賢兩個從孫，3 歲及 4 歲，也封為安平伯及東安侯。至於袁崇煥，位列 85，賞銀三十兩。魏忠賢更找機會，彈劾袁崇煥，袁崇煥憤而請辭，魏忠賢立即批准。

50 天後，天啟帝病死，由其弟朱由檢繼位，名為崇禎皇帝。喪事之後，崇禎皇帝立即賜死魏忠賢，並破格升袁崇煥為最高軍銜“薊遼督師兼兵部尚書”，朝廷即命下，促袁崇煥盡快到北京就職。

皇太極方面，懼袁崇煥，終繞道蒙古，於居庸關旁，直進北京。

袁崇煥得知，立即從寧遠率騎兵九千，日夜兼行 300 里，到廣渠門外，軍馬疲勞，盡缺糧草，仍說“不許一兵入民家，即野外樹木，亦不得傷損”。在北京城外力戰八旗軍，而最終獲勝。皇太極嘆道“十五年來，未嘗有此勁敵也！”

可惜，崇禎皇帝誤信了皇太極的反間計，迫使袁崇煥下獄。

袁崇煥被拿時，“三軍放聲大哭”。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成基命，年七十，“獨叩頭，請慎重者再”。原大學士孫承宗、吏部尚書王來光、總兵祖大壽，同為袁崇煥鳴冤。大學士成基命，向崇禎諫言，跪在門外十二小時未起。一位 70 歲的老人，向一個 20 歲皇帝，長跪 12 小時，難道不足以畫出崇禎帝獨裁昏庸的形象嗎？

袁崇煥臨刑前作《絕命詩》“一生事業總成空，半世功名在夢中，死後不愁無勇將，忠魂依舊守遼東”。1630 年 8 月 16 日，袁崇煥被以“莫須有”罪名，在北京西市參遭磔死。袁崇煥，在遼疆九年“杖策只因圖雪恥，橫戈原不為封侯”《邊中送別》。《明史》評論“自袁崇煥死，邊事益無人，明亡徵決矣！”身為薊遼督師，死後竟“家無餘財”，古今中外，能有幾人？有人問：天下何時太平？岳飛答道：“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惜命，天下太平矣！”

袁崇煥的確做到。

至此，大家才明白，為何余義士願意為袁督師，生生世世去守墓。

天壇

人民英雄紀念碑，緬懷英雄烈士，並有愛國教育之用。

愛國，源於“所愛之國”之人，更源於其人之行為。因此，緬懷過去眾多人物之情，成為愛國情懷的根本所在。所以，歷史人物象徵了這個國家的文化。

若愛國之情，純以一國疆界大小而發。因擴充發展，本是人之常情，本身亦無不妥。但此擴充發展之情，不落在栽培人物、建立健康文化方面，而只落在地圖的界線上，豈不容易挑起擴張與吞併他國的貪念？

當然，不是說國家的界線不重視，反而中國十分重視這條界線，多年來修築長城，就是一個很強烈的證明。但是，中國重視界線的原因，目標非為向外擴張，而是在守：守我們的文化，守我們的民族，守我們的國土，然後才盡最大的努力，守我們的邊界。

這種守護，是因為珍惜，希望長存，不想它消失，即使一時消失，也希望再發揚。中華文化，可說是因情而守，因情而繼。中華文化向前發展，一定是繼往而開來。無論未來科技多發達，我們都是繼前人之所願，如其所願。表達此情，便願立碑、立壇。祭之，以表達對美好文化之源的嚮往，而願珍惜之、願守護之、願發揚之。這是中國文化所發現的一種無私的性情，孔子稱為仁。

所以，中國之祭，先不問客觀神靈是否存在？而重在表達內心這種珍惜之情，所以祭禮、祭樂，才是重要。這種珍惜之情，中華文化特重三個方面，依唐先生所說，總結為三祭，分別是祭天、祭祖、祭聖賢。

祭天，就對自然天地的感激。祭祖，就對父輩祖宗的感激。祭聖賢，就對文化之源，及於對社稷有功德之人的感激。所以中華文化所孕育的人，都是認祖認宗的人。中華文化罵人最不堪的是禽獸。為甚麼？因為禽獸最不堪的不是凶殘，而是忘本。

天壇，本屬帝王之祭，依此祭，使帝王知其上，還有天道，便知學無止境，對待萬民，亦知應是教無止境。孔子言其一生“學不厭，教不倦”，亦是知此有天道的存在。所以，天壇不重在表現其華美，而重在莊嚴之中，表現對天地與人民的廣大包容，所以為王者，必敬天，必愛人。

盧溝橋

今天是 8 月 15 日，79 年前的今天，日本裕仁天皇，宣布無條件投降，而中國人民，終於迎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。八年抗戰的序幕，就在 1937 年 7 月 7 日的盧溝橋，史稱七七事變。



盧溝橋，建成於金代（1192 年），中國四大名橋之一，七七事變後，為它賦予了特別的意義。

日本帝國主義。日本在唐代，便接受中國文化，在近代又接受西方文化。面對這些帝國主義的文化，中國亦原有自感不如的地方。這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，更自謂負有文化使命。如西方之兵艦商船，亦同時帶來教士為中國人贖罪，辦醫院、興學校。日本之侵略中國，自謂要保衛東洋文化，其中亦包括中國文化，謂中國人已不能保護其文化。

他們的入侵，在中國人心目中來看，既有「勢」，亦有「理」；似魔鬼，又似神聖。於是中國人有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，亦有歌頌西方的；有親日的，亦有抗日的。這些外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，皆以中國為戰場，中國人亦各依傍所崇尚的不同外國勢力，自為戰士，內部互相戰爭，血內相拼，共同破壞中國文化，亦共同從事於民族自殺。

唐僧取經九九八十一難中之第八十難，說到唐僧到了小西天。但這個小西天是假佛。世間上神魔混雜而成之假佛，是最不容易拆穿，此難今日是很不易過去。

此難應如何回應？霍先生曾以「接、轉、開」來形容他的教學法：強調先要入學者之心，「接」其所困，知其所限，然後「轉」之，使其打開自己，突破障礙。《我為甚麼要辦國學院？》（霍韜晦，2018）唐先生，亦有相似的回應。

唐先生說，此回應之道，就如當年中國接受佛學，超越佛學，以創造中國佛學。此轉化之道，必能接受今日所遇之世界文化有價值的部份。但前提必先有能力，將磨難中之有神聖意義的成份，與其魔性的成份，加以分離。

「轉」解釋為“轉變”，並非最恰當，因為範圍太廣濶，亦沒有一定的規則或理由所依從。由一樣東西，轉變成另外一樣東西，從可能性上，當然不可說無。但從現實上，則未必會有。所以寧願解釋為“轉化”，基於自身本性，再自行超越，變得更有內涵、深度、意義，而能影響更廣的一個深化過程。

例如科學技術，如何通往格致之道；民主思想，如何通往民貴之義；西方宗教，如何通往敬天敬人之德。這些都是把“器”物，賦予人文精神色彩，超越其自己本有的意義，化為更高層次的“文”物。物成為“文”的層次，對人類便有正面教化的社會作用。

但人能接受文化，創造文化，繫於：生命主體健康充實而「有」力，「無」內在的病痛，及對此生命主體之力「有」信心。此三點的培養，必待一生命的學問，或精神修養的學問而後有。

中國歷代曾經歷三類大挑戰。第一、民族侵略，如秦皇漢武年代。我們要具備民族主義精神及相當的武力與經濟力，才能成功回應。第二、文化流入，如隋唐佛教東來。我們亦依於自身文化，把印度佛學吸收並轉化，創造出中國佛教，而亦能回應成功。第三、內在的文化病痛，如清代制度扼殺中國文化，只能談文字分析之學。最後辛亥革命以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」去回應，民族生命得以回應成功，但文化生命則未能康復。後來歷史又再度重演，來自西方及日本的民族侵略，與西方不同思想理論的流入，再加上中國本身文化神魔混雜的情況，使中國人的生命長久未能得回對自身的信心。因此，中國今後，如何看破這神魔混雜的世界，重新建立自身的文化生命，而終把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合一，而生命能得一真自信，中華民族，才能真正走出那八十難。

盧溝橋已成為歷史，中國亦得回民族生命的尊嚴，當中的軍事與經濟能力，所謂“國力”，亦即硬實力，亦不斷在進步當中。同時，今日中國人當要去除自身的病痛，找回文化生命，重新重視生命成長之學，所謂“國學”，亦即軟實力，以求民族與文化的最終統一。所以，文化要回歸生命，我們中華民族，才能真正成為一個頂天立地而能對世界有貢獻的民族。